

摘要

筆者將時空間所形塑的「區域」，觀察明代中後期蘇州文人士大夫藉由自我認同的區域意識，將蘇州地區長久以來歷史文化的積澱與耕耘，成為全國文化主導區域。從明代中期開始，在蘇州的文人士大夫，便以身為蘇州人為傲，從王鏊主持撰寫的《正德姑蘇志》，到王穉登的《國朝吳郡丹青志》，與十七世紀文震亨所著《長物志》，蘇州文人們皆不斷的自我提醒與昭告外界：蘇州地區的文風是傲視全國。明代中期的吳門書派與畫派，在文徵明的時代達到最高點。文徵明過世後，到了十七世紀的松江地區的董其昌以成為「集大成」者為目標。董其昌認知到在書畫藝術中為了要提升自我區域風格的高度，將文徵明所代表的吳門書派視為對手而欲超越之。這時候在蘇州的藝文圈中最富盛名的「布衣」「山人」的身分就以王穉登莫屬。

本文以王穉登的生平、書蹟書事、吳門書畫收藏以及王穉登撰《國朝吳郡丹青志》，呈現明代嘉靖至萬曆年間蘇州地區藝文活動活動，探究吳門地區在明代中後期的藝文活動。蘇州的藝術文化在明代中期的文人間形塑的巨大凝聚力與影響力，以「文徵明」為最重要的影響者，文徵明過世之後約五十年，吳門地區縱使失去了偉大的領導者，明代的藝壇失去了「大師」，但是至晚期蘇州文士們仍懷抱著以蘇州為傲的心境，繼續活躍於書畫藝術活動。王穉登的書蹟在文徵明風格巨大影響之下，又具有個人特色，並非僅是被列為吳門書派的末流。王穉登的書事與鑒藏活動等藝文交遊活動，反映明代晚期蘇州地區仍是文化藝術的翹楚。